

大道 路径

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

DA GUO LU JING

ZHONG GUO GAI GE ZHEN WEN TI TAN SUO

宋圭武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大國 路径

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宋圭武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

ISBN 978 - 7 - 5136 - 0788 - 9

I. ①大… II. ①宋… III. 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3855 号

责任编辑 邵 岩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任燕飞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788 - 9/F · 8883

定 价 3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屈原《离骚》

前言 中国现代化的三次解放

近代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这为国家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解放。领袖人物是孙中山。但辛亥革命有“破”而没有“立”,也就是虽然打倒了皇帝,开启了中国民主和共和的进程,也打开了中国走向阳光时代的大门,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迎来一个真正的民主和共和的时代,而是一个军阀内乱和遭受帝国殖民的时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标志着中国从此摆脱了列强的欺辱和殖民,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解放。领袖人物是毛泽东。第二次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独立自主的基础,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独立进行现代化的探索期。

但中国的现代化还面临着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就是要将国人从旧的不合理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是第三次解放的时代大背景。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是精神的现代化。所以,没有精神的现代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实质和灵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人文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开启于五四运动,但进程缓慢而扭曲。因为人文精神的转变往往是顽固和渐变的。改革开放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也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变革的进程。目前,国家坚持科学发展,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问题是在一些具体方面,一些传统的不合理的人文精神仍以不同形式和面目束缚着国人的思想和言行,仍深层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国人从旧的不合理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发展的第三次解放,也标志着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最终解放条件。

中国若不进行第三次人文精神方面的解放,中国发展就有可能落入到发展的“文化陷阱”中,以至于将会有可能陷入一种长期的低水平循环中。

中国要实现人文精神的解放,核心是要确立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

前

言





神。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但比民主和科学更重要和更基础的,是诚信和理性。

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真和求真,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没有理性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扭曲的,发展就是高成本的。没有理性精神,最终也就没有科学精神。高污染,高投入,实质就是发展缺乏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

诚信是道德的灵魂。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扭曲的,社会本质就是缺乏道德的,这样经济发展就会与社会发展相分离,物质建设就会与精神建设相分离。另外,没有诚信精神,遵守市场交易契约的精神就缺乏,这样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从而也就导致国家很难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于规则本质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约定,或可以看成是众人达成的一种共同契约。所以,没有诚信,规则意识也就淡薄,这样法治国家的建立也就很困难。还有,没有诚信,民主最终也就是伪民主。因为没有诚信,意志的表达就是虚假和不真实的,这与民主的精神实质是相悖的。

从历史演进过程看,中国的发展,既缺乏理性精神,也缺乏诚信精神。而且目前,国人在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方面,仍然是十分缺乏的。而要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最重要的是需要打破一个由面子、血缘、权力三者构成的三角形陷阱。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面子意识反映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即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即人面前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就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即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就是形成两极人格。即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当然,面子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

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产生不了内在的和深层次的恐惧感,所以,面子约束有可能导致约束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最终社会运行也就面子化。而在社会运行的深层次,实质会按照另外一种规则来运行,这就是潜规则的泛滥。

血缘意识实质就是基因意识,就是以遗传基因比例作为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重要变量。

在中国,血缘主要为国人获取利益提供了一条合作的有效路径。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就是按照血缘的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组合,而不是按照其他法则。

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当然,关系也不是随便就能建立的,它需要资本的投入,你投入越多,你的关系就越硬,你的关系的通道就越坚固。关系实质就是“私”。讲关系就没有了公共意识,而没有了公共意识,实质也就没有了私人的长远利益,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广泛的,但从社会现实看,权力形式主要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体制,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官员。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优势,如垄断等,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垄断企业等。文化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和学术垄断,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明星。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集权泛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国人的观念以及一些制度设定方面产生深层作用。如官本位意识浓重等。

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游戏的一个三角形均衡,也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





这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不但稳固,而且持久,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以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以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这个三角形循环实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坑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权力就像丈夫,面子就像妻子,血缘就像儿子,三者手拉手,围绕旋转的中心就是利益。利益是这个三角形陷阱的主题和中心。这里人们追求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性的利益和物质性的利益。精神性的利益包括各种社会评价、社会荣誉等,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物质性的利益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等,既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也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由于精神性的利益与物质性的利益都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追求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时,二者存在边际替代现象。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很难健康生长的。由于面子与血缘都是按照两套规则来行事,面子上是一套,面子下是一套,血缘内是一套,血缘外是一套,所以,面子和血缘本质都是反诚信的;权力追逐的是“真利”,而不是真理,需要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就只能寄存在良心的世界里,而在社会实际的游戏里,诚信和理性是没有用武之地或很少有用武之地的。而良心又具有弹性的特点,在秩序不健全或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人们的良心世界也会萎缩。所以,在三角形陷阱中,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稀薄就是必然的。

道德和科学是支撑社会健康发展的两只车轮。而诚信是道德的轴心,理性是科学的轴心。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就既不能很好体现出道德性,也不能很好体现出科学性,发展就少了两只优质的轮子。这就使得发展脆弱或发展的摩擦力增大,弄不好,就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只有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或三角形循环,同时,大力培育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要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就需要借助内部和外部的合力作用,从而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不断推进改革和开放。

第一,国家要不断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今后要重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要加大软建设方面的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发展虽然重视了精神方面的建设,但总体上是物质方面的成就要高于精神方面的成就。对社会而言,物质文明是肉体,精神文明是灵魂,没有健康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是扭曲和异化的。

第二,群众整体自觉是基础。如果说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领袖人物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第三次解放则领袖人物的作用要小一些,更重要的是需要群众的整体自觉。因为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变革是具有整体性的。在大家都普遍不注重诚信和理性的情况下,个别人或一部分人讲诚信和理性,其成本就是高昂的,其对社会的作用也是微小的。

第三,要促进群众整体的自觉,就需要加大习俗的改造力度。习俗是文化的一种外现形式,改造文化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在改造习俗方面,一是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对习俗的改造。二是要重视教育的作用,从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要抓起。三是要重视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四是要重视戏剧和电影对习俗的改造作用。陈独秀《论戏曲》中指出,“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和电影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五是要重视网络的作用,国家应加强对网络的管理,要坚决打击网络不良现象。

第四,要重视敬畏意识的培育。敬畏是产生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基础。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

第五,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执行规则方面,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实质也是参与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在制定规则方面,政府具有巨大的规模优势和影响力,所以,制定出的规则最终是否合理和有效与政府行为是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关键是要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实践看,任何社会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深层次上讲总是与政府改革和政府作用的好坏密切相关的。对中国改革而言,政府改革的成功与否以及政府作用发挥如何,将是中国改革最终成功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变量。

第六,在制度建设层面,要尽可能制定公平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要体现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对强势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约束;另一个原则就是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自由竞争不一定导致公平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弱势群体,所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是一条必须要体现的重要原则。具体而言,我国要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主要须做到:一是要进一步消除官本位体制;二是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和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提高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三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大力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五是在就业领域要尤其注重公平竞争;六是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制度,要多提倡决策的公开和协商。

第七,未来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应当是在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精神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主体人格的体现上,西方人文强调的是内在的自觉,是一种更注重表里统一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基础是诚信。而中国人文在人格上的体现是具有面子与礼仪特点的。这种面子与礼仪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自觉,它没有表里统一性,是一种分离的人格,其本质是缺乏诚信的。所以,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结合,在人的内在品格建设方面,应当积极吸收西方诚信的品格,同时,也要保留中国人格在外在形式上的礼仪文明。只有将这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人格建设才是完美的。否则,若只有诚信,而没有礼仪,诚信就会失之直莽;若只有礼仪,而没有诚信,礼仪就是禽兽身上华丽的外衣。所以,最好的情况应是,既有内在的诚信,又有外在的礼仪,这才是人格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关系建设方面,西方人文精神具有强调征服的一面,而中国人文精神具有强调和谐的一面。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实质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在关系层面,不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或是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最高的境界应

是和谐,而非其他。所以,在关系建设层面,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和谐所体现的境界要高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征服所体现的境界。笔者认为中西人文精神结合的方式应当是:内中外西。这里内中外西的含义就是要以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和谐为内容,以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征服为外在形式,或以和谐为目标,以征服为外在手段,或是以和谐为本,以征服为末,而不是相反。



目 录

第 一 篇 论经济问题	001
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及中国农村合作问题探讨	003
以国民幸福为切入点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018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对策	030
发展呼唤新重农主义	037
均衡财富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051
消费与快乐	059
对“斯密悖论”等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067
对有关经济学家等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083
“中国之谜”之谜	095
第 二 篇 论改革问题	103
中国改革要提倡适度竞争	105
绩效考核要注意克服三种倾向	109
中国改革若干理论检讨	114
职称评定制度及其完善探讨	128
教育拒绝重点	133
中国模式其实是中国“摸式”	137
论民主问题	143





第 三 篇	论公平问题	153
	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	155
	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165
	公平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径	172
	实现公平境界的障碍和困境	176
第 四 篇	论社会问题	181
	论偏见	183
	对“信任之谜”解释的再解释	188
	关系经济学	193
	经济学视角下人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探讨	199
	“李约瑟问题”研究与思考	206
	原罪实质及其发展意义探究	217
第 五 篇	论人文问题	225
	话说国人的零一三五四	227
	论节日问题	247
	论城市精神	252
	论文化现代化	258
	论中西文化之结合	269
后 记	学术研究的一点体会	275
参考文献		278

大国路经

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

第一篇

论经济问题

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 及中国农村合作问题探讨

在中国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属于人民公社的时代。公社是天,农民是地。从苦难的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民,建设公社也让他们有了天堂的梦和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但现实的公社也让他们尝到了酸甜苦辣,尝到了难忘的痛苦和记忆。如今,公社的梦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农村家庭承包制已经持续了30多年。反思公社,笔者认为,公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有许多看法仍须进一步澄清。下面笔者就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和中国农村合作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

目前关于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自然灾害方面找原因,如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等。二是从产权制度上找原因,认为是产权弱化导致排他性极差,从而失去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三是从分配制度上找原因,认为公社的分配制度没有提供有效的激励。四是从社员身上找原因,如社员的自私、偷懒等。五是从公社管理上找原因,认为是代理人寻租造成了对社区福利的损害,以及瞎指挥等。六是从人口增长方面找原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黄宗智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时,认为造成农业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根源不是集体制本身,而是农业的“过密化”。亦即在生存压力和劳力多余的情况下,集体单位不断地投入劳动力,尽可能地增加产量而无视社员的实际收入,直到其边际产品等于零。他注意到,集体劳动犹如大家庭,不能解雇其过剩劳力,不容忍部分人失业,哪怕这意味着对其他劳动力更有效地使用。七是从人民公社规模上找原因,认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在上述观点中,总体看法倾向于认为公社低效率主要是公社自身的原因,其中占主流的看法是认为产权制度模糊和分配上的平均





主义导致偷懒等机会主义泛滥等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尤以林毅夫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林毅夫先生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通过研究他认为,公社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进行的监督成本太高。他认为,“一个劳动者增加有效劳动投入量,既不会增加他的当前收入,也不会增加他未来的预期收入,这样他是不会有劳动积极性的,除非有人监督他”,并且,“增加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的监督是需要成本的,监督成本的增加量,往往比准确程度的增加量快得多”。因此,“如果监督成本的增加大于收入的增加”,那么,“最佳的监督程度可能就是不监督。在不能解散合作企业的前提下,计大概工,干多干少一个样,也可能就是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理性选择”^①。

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人民公社不成功其必然是内部机制的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但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②。

笔者认为,这种把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主要是公社自身内部的原因,并且认为监督成本高是主要原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的。笔者的观点是: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下面谈谈理由。

1. 公社内部监督成本是存在的,但并不高昂,因为相反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1) 公社的生产劳动大多是团队劳动,单个人分开进行劳动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而一个团队在进行统一劳动时,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从而也无形降低了监督成本,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

(2) 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这在农村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农村人都有好面子这一特点。而面子实质也是一种精神收益,具有一种隐

① 林毅夫:《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1版,第296页。

②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5页。